

分歧从何而来？

分歧从何而来？

——答多列士等同志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重庆人民出版社重印（重庆嘉陵路344号）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1·字数17,000

1963年2月第1版

1963年3月重庆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01·714 定价（四）0.10元

在当前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逆流中，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同志和某些法共同志，扮演着突出的角色。

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下旬起，多列士等同志集中地发表了大量的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言论，还公布了大批有关的内部文件。其中主要的有：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多列士在法共中央全会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居约在法共中央全会关于国际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团结问题的情况报告；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共中央全会关于国际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团结问题的决议；

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居约为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写的社论；

同日，法共中央机关刊物《新法兰西》周刊发表的题为《战争、和平和教条主义》的文章；

一九六三年一月五日——十六日，《人道报》接连刊载的十篇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章；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新法兰西》周刊刊登的题为《我們生活在什么时代》的文章；

一九六三年一月，法共中央出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問題》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收集了三年来法共某些领导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十五个文件，其中包括多列士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兄弟党莫斯科會議上的发言和他后来向法共中央全会所作的关于这次兄弟党會議的报告）；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五日，《人道报》刊载的居約写的文章。

这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論的主要内容，本报已經在二月二十四日发表。从这些言論中，可以看到，多列士等同志在最近的反华大合唱中，在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竞赛中，特別卖勁，超过了許多攻击我們的其他兄弟党同志。

多列士等同志除了攻击中国共产党以外，还恶毒地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責了朝鮮、緬甸、馬來亞、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日本等兄弟党，甚至还攻击了正在英勇地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他們誣蔑說，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什么“宗派主义和冒險主义”的立場，“已經在特别是亚洲的某些共产党內和在一些民族主义运动內得到了一些响应”，“滋长了这些党和运动中有时存在的‘左傾’主义”，等等。某些法共同志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所采取的这种态度，实在是令人吃惊的，他們在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方面，实在是走得太远了。

中国共产党早就认为，現在仍然认为，兄弟党之間的分歧，必須而且应当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則，在自

己队伍的內部，通过平等的同志式的充分討論和協商，求得解決。我們沒有首先發動對任何兄弟黨的公開批評，也沒有首先挑起公開的爭論。但是，誰要是利用我們這種以團結對敵的利益為重的正確立場，任意公開攻擊中國共產黨，以為不會受到應有的回擊，那就打錯了主意。

我們願意告訴那些大肆攻擊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兄弟黨的同志們：兄弟黨的關係是平等的，既然你們公開地大肆攻擊了中國共產黨，那麼你們就沒有權利要求我們不作公開的答复。同樣的道理，既然你們公開地惡毒攻擊了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那麼阿爾巴尼亞同志就完全有平等的權利公開地答复你們。現在，有些兄弟黨同志，一面講要停止公開論戰，一面却在繼續對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兄弟黨進行攻擊。這種兩面態度，實際上是只許你們攻擊別人，而不許別人回答你們的攻擊。這是絕對辦不到的。中國古語說：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我們覺得，現在有必要鄭重地提醒那些攻擊中國共產黨的人注意這一點。

多列士等同志在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時候，講到關於我們時代的性質、對帝國主義的認識、戰爭與和平、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等等問題。但是，任何人只要仔細看一看，就會發現，他們只是重複別人早已講過的論點。對於他們在這些問題上的錯誤論點，在本報社論《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基礎上團結起來》以及紅旗雜誌社論《列寧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這四篇文章中，已經作了回答，沒有必要在這

里再来重复地討論。

值得指出的是，多列士等同志在他們的講話、報告和文章中，用了大量篇幅歪曲事實，顛倒是非，混淆視聽，企圖把破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團結、製造分裂的責任，強加在中國共產黨的身上。他們喋喋不休地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分歧“特別是中國同志們造成的”，分歧的由來是因為中國同志“實質上還沒有接受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論點”。他們還說什麼離開第一次和第二次兄弟黨莫斯科會議越遠，中國同志的立場“離開他們自己贊同並投票同意的論點也就越遠”。

既然多列士等同志提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生分歧的責任問題，那麼我們就來談談這個問題吧。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分歧究竟從何而來呢？

多列士等同志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分歧是由於中國共產黨沒有接受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論點而產生的。多列士等同志這種說法的本身，是違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規定的兄弟黨關係的準則的。根據這兩個共同文件，兄弟黨的相互關係是平等的、獨立的。任何人都沒有權利要求所有兄弟黨接受某一個黨的論點。任何一個黨的任何一次代表大會的決議，都不能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路綫，對別的兄弟黨都沒有約束力。多列士等同志甘心情願接受另一個黨的論點和決議，那是他們自己的事情。至於中國共產黨，我們一貫認為，對我們和所有兄弟黨具有約束力的共同行動準則，只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只能是兄弟黨一致協議的共同文件，而不是任何一個兄弟黨代表大會的決議或者任何別的

什么东西。

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有它的积极方面，也有它的消极方面。对于它的积极方面，我們表示过支持。对于它的消极方面，即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重大原則問題上的錯誤观点，我們历来是有不同意見的。我們在中苏两党会谈中，在兄弟党會議上，都沒有隱蔽自己的观点，曾經多次明确地讲过我們的意見。但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們从来沒有公开地討論這個問題，在这篇文章里也不准备討論這個問題。

事实很清楚，近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的产生，完全是由于某些兄弟党同志違反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協議的莫斯科宣言。

大家知道，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會議，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經過同志式的协商和集体努力，消除了兄弟党之間的某些分歧，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的重大問題，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制定了莫斯科宣言。这个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綱領。所有的兄弟党都宣布接受这个綱領。

只要所有的兄弟党在實踐中严格遵守而不違反这个宣言，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就会得到加强，我們的共同斗争就会得到发展。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會議以后，在一段时間里，在反对共同敌人、首先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

党的团结战斗是比较顺利的，也是有成效的。

但是，由于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屡次企图把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置于各国兄弟党的共同纲领莫斯科宣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特别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戴维营会谈前后，某些兄弟党同志，在关于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发表了一系列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违反莫斯科宣言的错误观点。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的科学论断，不断宣扬在帝国主义制度和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还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存在的条件下，就“已经有现实可能最后地、永远地把战争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就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他们当时还预言，一九六〇年“将会作为开始实现人类关于没有武器和军队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的宏愿的一年而载入史册。”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依靠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国际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群众运动的联合斗争来防止世界战争的论点，把维护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大国首脑人物的“明智”上，认为目前时代的历史命运实际上是由个别“大人物”和这些大人物的“明智”决定的，认为大国首脑人物的会晤能够决定和改变历史的进程。他们说：“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只有掌握大权的各国政府首脑才有能力解决最复杂的国际问题。”他们把戴维营会谈说成是什么国际关系中的“新阶段”、“新纪元”，甚至说成是“人类历史的转

折点”。

他們違反莫斯科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成为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成为人民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的論断，特別热衷于頌揚美帝国主义的首腦人物艾森豪威尔，說他“真誠希望和平”，“真正希望消除‘冷战’状态”，“也像我們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

他們違反莫斯科宣言所指出的关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則，把和平共处仅仅解釋为意識形态的斗争和經濟竞赛。他們說：“必須努力使两种制度之間不可避免的斗争变成只是两种意識形态之間的斗争，变成和平竞赛——或者用資本家更容易理解的語言說——竞争。”他們甚至把两种社会制度不同国家的和平共处，引伸到压迫階級同被压迫階級、压迫民族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方面去，說什么和平共处是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完全脫离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階級斗争的观点，实际上借口和平共处而抹煞反对帝国主义和支持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政治斗争，抹煞国际范围的階級斗争。

他們違反莫斯科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力图“以新的形式給已經解放了的人民重新套上殖民枷鎖”的論点，鼓吹帝国主义能够帮助不发达国家的經濟达到空前的高漲，实际上否定掠夺不发达国家是帝国主义的本性。他們說，“全面彻底裁軍还会創造嶄新的条件，以援助一些目前在經濟上还不发达、而需要比較发达的国家給予援助的国家。即使把由于大国停止軍事开支而抽出来的資金一小部分用来帮助这些国家，也就

能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开创一个崭新的纪元。”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和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是当代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的论点，把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对立起来。他们虽然有的时候也说应该支持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但是又反复强调“在现今条件下爆发的战争必然会成为世界大战”，“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战”，反复强调要“反对一切种类的战争”。这实际上是对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不加区别，借口防止世界大战，反对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反对一切正义战争。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存在着和平的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的论点，关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论点，而片面地强调和平过渡的“越来越大的现实可能性”，说什么和平过渡“对于一系列国家来说，已经是现实的前景”。

从上述这一系列的错误论点中，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各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已经不复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莫斯科宣言应该废除了。

散布这些错误论点的兄弟党同志，不论用什么样的借口，什么“外交辞令”呀，什么“灵活性”呀，都不能掩饰他们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的原则，都不能推卸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歧的责任。

近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就是这样引起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又是怎样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的呢？

多列士等同志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公开化的起点，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六〇年夏天以各种文字出版《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兄弟党内部分歧的公开化，并不是在一九六〇年夏天，而是早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戴維营会談前夕，具体地說，在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就开始了。在这一天，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顾中国方面多次說明真相和劝告，迫不及待地通过自己的国家通訊社对中印边界事件发表了一項声明。这个声明不問是非曲直，对中印边境冲突表示“遺憾”，实际上指責中国的正确立場。他們还說什么这是“可悲的”、“愚蠢的”。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到一个資本主义国家的武装挑衅的时候，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但不指責发动武装挑衅的反动派，反而指責自己的兄弟国家，这在历史上倒真是第一次。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立刻觉察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存在的分歧，并且利用了那个錯誤的声明进行恶毒的挑撥离間。資產階級的宣傳机器当时大肆宣傳說，这个声明是“飞往中国的外交火箭”，声明的“口气有点像一个严峻的父亲冷酷地教訓孩子放規矩点”。

在戴維营会談以后，有些同志竟然冲昏了头脑，越来越放肆地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公开攻击。他們公然誣蔑中国共产党企图“用武力去試試資

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像公鸡好打架那样热中于战争”。他们还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誣蔑中国共产党在国家领导方面实行“冒险主义”的政策。

这些同志在长时间内，热中于宣传他们的错误观点，攻击中国共产党，把莫斯科宣言完全置诸脑后。这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造成了混乱，使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迷失方向的危险。多列士同志想必记得，当时法共机关报《人道报》竟然大肆宣扬“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找到了共同语言，和平共处的语言”、“美国发生了转折”。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莫斯科宣言，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使全世界人民了解我们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在纪念列宁九十诞辰的时候，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在那个时候，虽然我们已经被人攻击了半年多，虽然我们在文章中讨论到那些违背莫斯科宣言的错误论点，但是，我们还是以团结为重，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

多列士等同志把我们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公开化的起点，是把事实完全弄颠倒了。

一九六〇年五月，美国U—2间谍飞机侵犯苏联，四国首脑巴黎会议流产，我们本来希望那些曾经大肆宣扬所谓戴维营精神的同志，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加强兄弟党、兄弟国家的

團結，共同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但是，同我們的希望相反，在一九六〇年六月初世界工會聯合會理事會北京會議上，有些兄弟黨同志竟然不贊成譴責艾森豪威爾，並且散布了許多錯誤觀點，還反對中國同志的正確觀點。特別嚴重的是一九六〇年六月下旬，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兄弟黨會談中，有人竟然揮舞指揮棒，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大舉圍攻中國共產黨。這種做法，粗暴地破壞了兄弟黨協商解決共同問題的原則，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開了一個極端惡劣的先例。

多列士等同志說，在布加勒斯特會談中，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代表“對蘇共進行攻擊”。但是，參加這次會談的同志們都很清楚，在這次會談中，阿爾巴尼亞同志並沒有攻擊什麼人，只是堅持了自己的見解，沒有服從指揮棒，不同意對中國的攻擊。在那些把兄弟黨關係看成是“父子黨”關係的人的眼里，一個小小的阿爾巴尼亞竟敢違抗他們的指揮棒，真是膽大妄為，大逆不道。他們從此對阿爾巴尼亞同志懷恨在心，採取種種惡劣手段，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布加勒斯特會談以後，那些攻擊中國共產黨的同志們，迫不及待地採取了一系列的嚴重步驟，施加經濟的和政治的壓力，以至不顧國際慣例，背信棄義，單方面撕毀兄弟國家間的協定和合同。這種協定和合同不是幾個，或者幾十個，而是幾百個。他們這種把思想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的惡劣做法，完全背棄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完全背棄了莫斯科宣言規定的社會主義兄弟國家關係的準則。這些同志對自己的這種大國

沙文主义錯誤不但不进行自我批評，反而責备中国共产党犯了什么“单干”、“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民族共产主义”等等錯誤，这难道是合乎共产主义道德的嗎？多列士等同志是明白事情的真相的，但是他們不敢批評那些真正犯了把政治、思想爭論发展到破坏国家关系的錯誤的人，反而指責中国同志“将国家問題与政治、思想問題混淆在一起”，这种不分是非、顛倒黑白的态度，才是真正可悲的。

从上述的这些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會議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加剧，完全是某些兄弟党同志在一系列的重大問題上越来越严重地違反兄弟党一致協議的共同路綫、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則的結果。

多列士等同志不顾事实、顛倒是非的做法，还突出地表现在他歪曲一九六〇年莫斯科會議的真实情况，攻击中国共产党“不贊同国际工人运动的路綫”，給會議“造成困难的局面”。

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們不願意在这里談到这次兄弟党內部會議的詳細情况，我們准备在适当时机和适当場合說明真相，弄清是非。但是，必須指出，中国共产党恰恰是一九六〇年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的創議者。我們努力促成这次兄弟党會議的召开。在會議期間，我們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反对了某些兄弟党同志的錯誤观点，同时在某些問題上作了必要的妥协。我們同其他兄弟党共同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使會議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达成了一致的協議，发表了莫斯科声明。以

仅这些事实，就足以拆穿多列士等同志的謊言。

一九六〇年莫斯科會議以后，各国兄弟党理应根据一致協議的声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集中力量，共同对敌。一九六一年一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會議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的決議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終不渝地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則，将如维护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一样，维护这次會議的声明，并且坚决地为实现这个文件所規定的共同任务而努力奋斗。”两年多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忠实地执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協議，并且为维护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但是，多列士等同志竟然攻击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六〇年莫斯科會議以后，“繼續就各党共同拟定的政策的主要方面表示不同意見”，并且說中国同志的“立場对整个运动的利益有害”。

在一九六〇年莫斯科會議以后，究竟是谁在一系列問題上越来越严重地違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呢？

在莫斯科會議以后不久，苏阿关系进一步恶化了。多列士同志企图把苏阿关系恶化的責任，推到中国共产党方面。他竟然指責中国沒有“利用自己的影响来引导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人比較正确地了解他們的义务”。

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一貫主張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規定的独立、平等、协商一致的准則，来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間的关系。我們对于苏阿关系也一直坚持这种主

張。我們曾經懇切地希望苏阿关系能够得到改善，并且为此尽了自己的国际主义責任。我們曾經多次劝告苏联同志，在改善苏阿关系方面，大党大国應該采取主动，應該通过內部平等协商来消除分歧，即使某些分歧一时解决不了，也应该耐心等待，而不應該采取可能使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任何步驟。中共中央曾經为此写信給苏共中央，希望通过协商途徑解决苏阿关系問題。

但是，我們的这些真誠努力，並沒有受到重視。从发罗那海軍基地撤退舰队，从阿尔巴尼亚撤退专家，断絕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干涉阿尔巴尼亚內政等等一系列的事件发生了。

对于这些粗暴違反兄弟国家关系准則的行为，中国共产党感到痛心。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又一次向苏联同志提出改善苏阿关系的同志式的忠告。但是，出乎我們的意料，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出現了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严重事件，开创了在一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攻击另一个兄弟党的恶劣先例。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为了維護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則，为了共同对敌的利益，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种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做法。

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的这种严正态度，竟然受到指責。有的同志甚至說，“如果中国同志們願意出力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各兄弟党的关系正常化，那么，未必有誰会比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促进这一問題的解决”。这些話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說，中国同志要对苏阿关系的恶化負責，那是故意推卸責

任，諉过于人。如果这是希望中国同志促进苏阿关系的改善，那么，我們願意指出，那些同志完全不顧我們的多次劝告，坚持恶化苏阿关系，甚至公开号召改变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領導，这就在实际上剝夺了其他兄弟党对苏阿关系的改善进行有效努力的可能性。这次大会以后，这些同志悍然断絕了苏联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这难道不是有力地证明，他們根本沒有改善苏阿关系的願望嗎？

多列士等同志責备中国報紙“散布阿尔巴尼亚領導人的錯誤論点”。必須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来是反对把我們內部的分歧公开的，但是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却坚持要把分歧公开，并且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是不符合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在苏阿分歧已經公开化的情况下，我們把爭論双方的某些材料，同时加以发表，以便中国人民能够了解事情的真相。难道可以这样认为，似乎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可以任意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責另一个兄弟党，說它的領導是反列宁主义，是要博得享受帝国主义施舍三十枚銀币的权利，是双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等等，却不容許这个兄弟党为自己辯护，也不容許其他兄弟党同时发表爭論双方的有关材料嗎？那些自命为“完全正确”的人，自己連篇累牘地发表了攻击阿尔巴尼亚的文章，但是，对阿尔巴尼亚同志答复他們的文章，却害怕得要死，自己不敢发表，也害怕別人发表，这只能暴露他們的理亏心虛。

多列士等同志还指責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党人之間可能存在或出現的分歧拿到群众运动中去”，特别是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會議上，“把爭取民族解放